



商周时期原始宗教文化变迁与木本植物类意象群演化*

邵炳军 黄泽浩

摘 要:商周时代的诗人们根据远古时代崇拜物的不同特性,对木本植物的原始文化意象进行创造性继承与创新性发展,逐渐将其转换成为永恒吉祥之象、人物品行之象、政治生活之象、社会生活之象、婚姻恋爱之象。这些意象以自然崇拜信仰为基本前提,其中的原始宗教象征意义逐渐变得隐蔽,习惯性联想形式成为显性因素,呈现出由图腾崇拜或自然崇拜对象到具有多元化社会属性的文化意象,再到富有审美意义、象征意蕴的文学意象的动态发展链条。木本植物类意象群演化的直接动因是原始宗教文化由自然宗教文化向人文宗教文化的演进,内在逻辑是哲学观念由“万物有灵”自然观向“天人合一”宇宙观的转型。

关键词:“万物有灵”;“天人合一”;商周时期;文化变迁;木本植物意象群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669(2025)05-0093-08

“意象”,是指文学创作主体对创作客体有所感知,选用其中最能够恰切地表达自己主观情思的客观物象或客观事象,通过创作运思层面由“内化”向“意化”的转变与文本表述层面由“言”向“意”的转化,所构成的具有信息记忆、生成与传递功能的象征性文化符号^[1]。“木本植物类意象群”,是指诗人以原始先民有关植物神话传说为重要依据,以神圣化、人格化的自然崇拜信仰为基本前提^①,以各类木本植物作为创作客体与审美对象,采用“托兴众芳,寄情花木”^[2]的艺术方式,通过木本植物人格化与人格自然化的双向互动审美过程,所经营的具有丰富象征意蕴的意象系列。这种意象的演变彰显了中华文明符号系统在发展中兼具动态性与连续性的特征,是原始宗教文化变迁的结果。“原始宗教文化变迁”,主要指以图腾崇拜、自然崇拜、祖先崇拜为核心元素与基本底色的原始宗教观念文化,随着生产力、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等社会因素的变革,在文

化内容和文化结构方面发生由量变到质变的文化进化,由此产生双向互动变革,进而促使传统文化元素与审美意识之间的互动共生关系发生变化。商周时期的诗人们创造性地将木本植物的原始意象转化为具有多元化社会属性的文化意象,进而形成具有相对稳定的象征意蕴的诗歌意象群。这种意象演化是原始宗教文化由“万物有灵”向“天人合一”变迁的结果,也是人类审美意识不断丰富发展的产物。

一、木本类植物意象的象征意蕴

商周时期诗歌中与植物图腾崇拜或自然崇拜相关的植物意象^②,涉及的具体木本植物共计49种,代表性文本主要有《诗经》《楚辞》中的诗篇,还有一些《周易》卦爻辞,及传世文献所载的逸诗、歌谣、谚语、鄙语等,大致有117首。商周时代的诗人们根据远古时代崇拜物的不同特

收稿日期:2025-03-31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诗经》与礼制研究”(16ZDA172)。

作者简介:邵炳军,男,上海大学诗礼文化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 200444),主要从事先秦两汉文学与诗礼文化研究。黄泽浩,男,上海大学诗礼文化研究院博士研究生(上海 200444)。

性,不断对木本植物的原始文化意象进行创造性转化,由“生物木本植物”逐渐发展到“社会木本植物”,再从“物质木本植物”逐渐发展到“木本植物文化意象”,派生出种类丰富的“木本植物文学意象”,进而形成了特色鲜明的“木本植物文化”^③。在中国传统文化生成、定型、发展、流变的历史进程中,这些木本植物图腾不仅成为中华民族的文化母题之一,更成为中国诗歌意象的文化原型之一。商周时期诗歌中木本类植物意象的象征意蕴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五种基本类型。

(一)象征永恒吉祥

商周时期包含此类意象的诗歌有7首,具体涉及16种木本植物。其中,最典型的是由松、榛、柞三种植物形成的文学永恒吉祥之象。

1. 松——由礼仪之象到福寿连绵之象

远古时代,野生之松^④是黄河中下游地区与四夷之地的人间名山与仙界神山上的“神木”,是这些地区世居族群的崇拜物^⑤。这些传世文献的记载,可以从考古资料与民俗资料中得到印证^⑥。商周时期,人们赋予松多种社会属性,如礼仪之象、国力强盛之象、理想人格之象、物皆青全之象、武备之象等^⑦。其中,礼仪之象是其最原始的文化意象。比如,《诗经·小雅·天保》为西周前期王室卿大夫祝颂天子福寿连绵及子孙之作。诗人将“松”这一客观物象与“柏”“月”“日”“南山”四个客观物象并列,来象征周天子;以“松柏之茂”这一客观事象来象征天子王业永恒,必然会“无不尔或承”,即像松柏之枝叶永远茂盛青翠而不衰落一样世嗣承袭。这样,诗人将礼仪之象创造性地转化为天子福寿连绵之象,使其成为中国诗歌中“松”意象的原型意象。春秋前期,“松”意象的象征意蕴更加多元化,如《颍弁》中的王族与王依附之象、《山有扶苏》中的国君远贤臣而近小人之象、《山鬼》中的大夫高洁品格之象等。这些文学意象不仅承载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文化基因(如“松”为“岁寒三友”之一),而且逐渐内化成为丰富多彩的“松”文化。

2. 榛——从礼仪之象到百福干禄之象

远古时代,野生之榛是黄河中下游地区神山上的神木,原始先民将其视为崇拜物。商周

时期,人们赋予榛许多社会属性,如礼仪之象、文武之象等。其中,礼仪之象是其最原始的文化意象。比如,《诗经·大雅·旱麓》为歌咏先周时期周文王受其先祖之功业以使百福干禄增而广之的乐歌。诗人依据榛子味美可食之特性,以“榛”这一客观物象来象征“干禄”,表现文王盛德之至,能够得到上天的眷顾,承袭先祖之“干禄”;以“瞻彼旱麓,榛楛济济”这一客观事象来象征“干禄”众多,表现文王盛德之至,能承袭先祖之众多“干禄”并将泽被后世。这样,诗人将礼仪之象创新性地转化为百福干禄之象。春秋时期,“榛”意象的象征意蕴更加多元化,如《青蝇》中的小人深藏不露之象、《简兮》中的贤者失位之象、《鸛鸣》中的永恒吉祥之象等。这些文学意象包含的以福禄寿喜吉祥文化话语为核心的传统价值取向,逐渐成为中华民族文化心理中最深层的基本内核与文化基因,并内化为一种民间信仰与民间习俗,形成丰富多彩的“榛”文化。

3. 柞——由礼仪之象到福祿众多之象

远古时期,野生之柞为黄河中下游、长江中下游广大地区神山上的神树,被这里的世居族群视作崇拜物。商周时期,人们赋予柞许多社会属性,如礼仪之象、隐士之象、正气之象、德行、阴气之象等。其中,礼仪之象为其最原始的文化意象。比如,《诗经·小雅·采芣》为西周后期王室大夫刺幽王不能锡命诸侯而以礼数征会之作。诗人依据柞树枝叶茂盛的特性,以“柞之枝”这一客观物象,来象征“君子”——外诸侯,即能够发挥方伯连率作用的诸侯;以“维柞之枝,其叶蓬蓬”这一客观事象起兴,言高大的柞树伸展着枝丫,枝繁叶茂,生命力格外旺盛;正兴诸侯承顺天子,而天子恩被优渥,像柞树枝叶一样茂盛,以此来象征天子赐予有功诸侯的各种福祿——车马、命服,且延及诸侯之臣子。诗人采用借古讽今的艺术手法,巧妙地将“柞”的礼仪之象转化为福祿众多之象。至春秋时期,“柞”意象的象征意蕴更加多元化,如《鸛羽》中的征人不得安处之象、《晨风》中的贤臣居位之象等。至后世,这些文学意象逐渐发展成为一种内涵丰富的“柞”文化。

要之,商周时代的诗人们根据远古时代木

本植物不同的特性,对礼仪之象这一原始意象进行创造性继承与创新性发展,逐渐将一些植物转换成为现实社会生活中各类福禄寿喜之象征物,即永恒吉祥之象。

(二)象征人物品行

商周时期包含此类意象的诗歌凡20首,涉及的具体木本植物共20种。其中,最典型的是由竹、杜、果形成的文学人物品行之象。

1. 竹——由物候之象到高洁品德之象

远古时代,野生之竹为黄河中下游地区及四夷之地众多神山上的神木,是这些地区世居族群的崇拜物。商周时期,人们赋予竹许多社会属性,如物候之象、春生之象、礼仪之象、管乐之象、君子有礼之象等。其中,物候之象是其最原始的文化意象。比如,《诗经·卫风·淇奥》为春秋前期卫人赞美武公品德高洁之作。诗人以竹象征君子,连续以“瞻彼淇奥,绿竹猗猗”“瞻彼淇奥,绿竹青青”“瞻彼淇奥,绿竹如箦”三个客观事象,赞美其道盛德善、德服相称、容止中礼。诗人由此实现由物候之象到君子品德之象的创新性转化。春秋中期到战国晚期,“竹”意象的象征意蕴更加多元化,如《竹竿》中的思念母国之象、《山鬼》中的道路险阻之象等。至后世,这些文学意象不仅成为“岁寒三友”与“四君子”中“竹”意象的原型意象之一^⑧,而且逐渐发展成为一种内涵丰富的“竹”文化。

2. 杜——由礼仪之象到国君好贤求士之象

远古时代,野生之杜为黄河中下游、长江中上游及四夷之地众多神山上的神木,是这些地区世居族群的崇拜物。商周时期,人们赋予杜许多社会属性,如礼仪之象、宗族兄弟和睦之象、君子德行庇佑子孙之象、君子勤政有德之象、君子失宗族兄弟之象,等等。其中,礼仪之象是其最原始的文化意象。比如,《诗经·唐风·有杕之杜》为春秋中期晋大夫赞美武公好贤求士之作。诗人以杜(赤棠)这一客观物象来象征君子,连续以“有杕之杜,生于道左”和“有杕之杜,生于道周”两个客观事象,来象征远道而来的君子,进而赞美“我”善体人情,渴望以“宾礼”中的饮食礼款待远道而来的君子,以申其求贤殷切之意,实现了“杜”由礼仪之象向国君好贤求士之象的创造性转化。这实际上是创新性继

承了西周初期以“常棣”象征王族兄弟之间相亲相爱的手足之情的意象经营传统。至后世,这些多元化的文学意象逐渐发展成为一种内涵丰富的“杜”文化,特别是以棠棣象征和谐融洽的兄弟情,强调至亲莫如兄弟的伦理道德观念,体现了中华民族珍视团结的传统美德。

3. 果——由礼仪之象到君子人格之象

远古时代,果为黄河流域中上游及四夷之地的广大区域神山上的神果,被这些地区世居族群视为崇拜物。商周时期,人们赋予果许多社会属性,如礼仪之象、阳刚之象等。其中,礼仪之象是其最原始的文化意象。比如,《易·剥·上九》爻辞曰:“硕果不食,君子得舆,小人剥庐。”这里以“硕果”这一客观物象来象征人物之权位,以“硕果不食”这一客观事象起兴,言万物若硕大之果居其上而不见食于人,必有再生之象;而君子居于阳位能止剥,小人居于阴位当自败。故《象》曰:“‘君子得舆’,民所载也;‘小人剥庐’,终不可用也。”于是,商周之际的爻辞作者依据“果”可采摘以食的特性,巧妙地将礼仪之象转化为君子居于阳位的再生之象,即君子人格之象。自先周时期至战国末期,“果”意象的象征意蕴不断多元化,如《杕杜》中的思夫之象、《丘中有麻》中的恋爱之象、《橘颂》中的君子文质之象,等等。至后世,这些文学意象逐渐发展成为一种内涵丰富的“果”文化。

要之,商周时代的诗人们,根据远古时代木本植物崇拜物不同的特性,对这些原始意象进行创造性继承与创新性发展,逐渐将一些植物转换成为现实社会生活中各类人格的象征物,即人物品行之象。

(三)象征政治生态

商周时期含有此类象征意象的诗歌凡51首,涉及具体木本类植物42种。其中,最典型的是由桑、柳、椒形成的文学政治生态之象。

1. 桑——由物候之象到国家安定祥瑞之象

远古时代,野生之桑为黄河中下游、长江中下游及四夷之地的广大区域众多神山上的神树,是这里世居族群的崇拜物。商周时期,人们赋予桑许多社会属性,如物候之象、礼仪之象、亡国之象、婚恋之象、农事之象、五行之象等。其中,物候之象是其最原始的文化意象。比如,

《易·否·九五》爻辞曰：“休否，大人吉；其亡其亡，系于苞桑。”爻辞作者依据“苞桑”（桑树之根）所具有的稳固牢靠的特性，以“苞桑”这一客观物象来象征吉兆；以“系于苞桑”这一客观事象来象征君子根本牢固可以居安除危，言居尊得位而能行休美之事，只有居安思危，戒慎行事，才能巩固根本而无倾危之忧。故《象》谓：“‘大人之吉’，位正当也。”商周之际的爻辞作者，将“桑”的物候之象巧妙地转化为国家安定祥瑞之象。自西周前期至春秋中期，“桑”意象的象征意蕴逐渐多元化，如《南山有台》中的王室贤臣众多之象、《汾沮洳》中的大夫之家不能用绝异贤才之象等。至后世，这些文学意象逐渐发展成为丰富多彩的“桑”文化。

2. 柳——由物候之象到王父不容嫡子之象

远古时代，野生之柳是黄河中下游、长江中游及四夷之地的广大区域众多神山上的神木，成为这些地区众多世居族群的崇拜物。商周时期，人们赋予柳许多社会属性，如物候之象、五音之象、礼仪之象、人性之象等。其中，物候之象是其最原始的文化意象。比如，《诗经·小雅·小弁》为西周晚期王室太子宜臼之傅讽刺幽王黜后、废嫡、立庶导致宜臼出奔西申之作。诗人依据柳为柔木的特性，以“菀彼柳斯，鸣蜩嘒嘒”这一客观事象言柳木茂盛则多鸣蜩，以此来象征大者之旁无所不容，反兴太子宜臼不能为其父所容，以至于黜后、废嫡、立庶，最终导致其出奔母舅之国西申，形象地反映出周幽王时期的政治生态。诗人将物候之象创造性地转化为王父不容嫡子之象，即恶劣政治生态之象。至春秋前期，“柳”（包括柳枝、柳絮、柳叶等）意象的象征意蕴更加多元化，如《菀柳》中的朝王将有祸之象、《东方未明》中的无常将致乱之象等。至后世，这些文学意象逐渐发展成为丰富多彩的“柳”文化。

3. 椒——从礼仪之象到小宗将取代大宗之象

远古时代，野生之椒是黄河中下游广大地区众多神山上的神木，成为这些地域世居族群的崇拜物。商周时期，人们赋予椒许多社会属性，如礼仪之象、婚育之象、族群强盛之象等。其中，礼仪之象是其最原始的文化意象。比如，《诗经·唐风·椒聊》为春秋前期晋大夫讽刺昭公

封桓叔于曲沃之作。诗人依据椒之“实繁茂多子”的特性，以“椒”这一客观物象来象征妇女多子，连续以“椒聊之实，蕃衍盈升”和“椒聊之实，蕃衍盈匊”两个客观事象来象征桓叔子孙繁衍日盛，暗示桓叔这一支终将代晋，反刺昭公封桓叔于曲沃将会产生以小宗取代大宗而立国的后果。诗人巧妙地将礼仪之象转化为小宗族群强盛之象，形象地反映出晋国小宗将取代大宗而立国的政治生态。至战国末期，屈原在《离骚》和《东皇太一》中，依据“椒”为“香木”与“椒浆芬芳”之特性，将其转化为自洁品德之象、贤德君子之象、礼仪之象等，实现了“椒”意象象征意蕴的多元化。至后世，这些文学意象逐渐发展成为丰富多彩的“椒”文化。

要之，商周时代的诗人们，根据远古时代木本植物崇拜物不同的特性，对这些原始意象进行创造性继承与创新性发展，逐渐将一些植物转换成为现实社会中各类政治生态的象征物，即政治生态之象。

（四）象征社会生活

商周时期包含此类意象的诗歌有14首，涉及具体木本类植物16种。其中，最典型的是由棘、荄楚、杞形成的社会生活之象。

1. 棘——由礼仪之象到凶终返吉之象

远古时代，野生之棘为黄河中下游广大地域众多神山上的神木，是这些地区世居族群的崇拜物。商周时期，人们赋予棘许多社会属性，如礼仪之象、艰险之象、法制之象、五行之象、小人之象等。其中，礼仪之象为其最原始的文化意象。比如，《易·坎·上六》爻辞曰：“系用徽纆，置于丛棘，三岁不得，凶。”故此爻辞根据棘刺可伤人的特性，以“棘”来象征社会生活中的险峻之处；以“系用徽纆，置于丛棘”这一客观事象来象征险峻之处不可升上，而严刑峻法使人不敢触犯法律，暗示三岁之后险道可除而凶终以返吉。爻辞作者创造性地将“棘”的礼仪之象转化为凶终返吉之象，实现了由政治意象向文学意象的转换。至战国末期，“棘”意象的象征意蕴逐渐多元化，如《湛露》《大东》中的礼仪之象、《青蝇》中的小人之象、《墓门》中的人失训导之象、《鸛羽》中的君子行役之象、《园有桃》中的君用民力之象、《葛生》中的夫妇生死相隔之象、

《凯风》中的子不能尽孝之象、《橘颂》中的君子武质之象,在秦人刺穆公以三良从死之作《黄鸟》中,又将其转化为臣事君不得其所之象。至后世,这些文学意象逐渐发展成为丰富多彩的“棘”文化。

2. 蓂楚——由神木之象到亡国之象

蓂楚就是现在所说的猕猴桃。远古时代,野生之蓂楚是黄河中下游地区神山上的神木,是这一地区世居族群的崇拜物。商周时期,“蓂楚”已由一种果树发展为一种文化意象。比如,《诗经·桧风·隰有蓂楚》为春秋初期桧人嗟叹国破家亡而民逃之作。诗人首章以“隰有蓂楚,猗猗其枝,夭之沃沃”这一客观事象起兴,写乐蓂楚之无知,反兴人以有知而不乐;次章以“隰有蓂楚,猗猗其华,夭之沃沃”这一客观事象起兴,写乐蓂楚之无家,反兴人以有家而不乐;卒章以“隰有蓂楚,猗猗其实,夭之沃沃”这一客观事象起兴,写乐蓂楚之无室,反兴人以有室而不乐。诗人以蓂楚来象征亡国,表现出悲哀的亡国之音,巧妙地将神木之象转化为亡国之象。

3. 杞——由礼仪之象到中正之象

远古时代,野生之杞为黄河中下游流域、长江流域神山上的神木,是这些地域世居族群的崇拜物。商周时期,人们赋予杞许多社会属性,如礼仪之象、贤才之象、财富之象、人性之象等。其中,礼仪之象是其最原始的文化意象。比如,《易·姤·九五》爻辞云:“以杞包瓜,含章,有陨自天。”这里以“杞”这一客观物象来象征人居于尊位,以“杞”“包瓜”“含章”这些客观事象,来象征处得其所而体刚居中,即处高体大、以高求下,内中含藏彰美之德;言杞之为物生于肥地、包瓜为物系而不食,含章未发而不遇其应,如同人履得尊位而不遇其应、得地而不食,乃命不流行,即居尊位而下求贤良,强调动机与效果要统一于美善。爻辞作者巧妙地将礼仪之象转化为中正之象。至春秋后期,“杞”意象的象征意蕴逐渐多元化,如《四牡》中的行役之象、《杕杜》中的思夫之象、《四月》中的祸乱之象、《北山》中的思母之象、《南蒯歌》中的不合人性之象等。至后世,这些文学意象逐渐发展成为以吉祥为基调的“杞”文化。

要之,商周时代的诗人们根据远古时代木

本植物崇拜物不同的特性,将礼仪之象、神木之象这些原始意象不断进行创造性继承与创新性发展,逐渐将一些植物转换成为现实社会生活之象征物,即社会生活之象。

(五)象征婚恋恋爱

商周时期包含此类意象的诗歌凡25首,具体涉及木本类植物11种。其中,最为典型的是由杨、梅、桃形成的婚恋之象。

1. 杨——从物候之象到老夫少妻之象

远古时代,野生之杨为黄河中下游、长江中下游及四夷之地广大地域众多神山上的神木,是这一地区世居族群的崇拜物。商周时期,人们赋予杨许多社会属性,如物候之象、礼仪之象、武备之象、徽号旌旗之象、灾祸之象等。其中,物候之象是其最原始的文化意象。比如,《易·大过·九二》爻辞曰:“枯杨生稊,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此爻辞依据杨“性坚劲”的特性,以“枯杨生稊”这一客观事象起兴,言枯萎的杨树生出了新枝芽,以阳处阴能过其本而拯弱兴衰之象,正兴“老夫得其女妻”。由此喻示老年之夫更得年少之妻,会像枯萎的杨树生出新枝芽一样富有再生力,爻辞作者将物候之象创造性地转化为老夫少妻之象。《易·大过·九五》爻辞则依据杨“性坚劲”的特性,将其转化为老妻少夫之象。自西周初期至春秋中期,“杨”意象的象征意蕴逐渐多元化,如《南山有台》中的邦家永恒之象、《巷伯》中的谗人误国之象、《采菽》中的天子不能以礼数征会诸侯之象、《车邻》中的天子赐命诸侯之象、《扬之水》中的征人屯戍之象、《东门之杨》中的婚姻失时之象等。至后世,这些文学意象逐渐发展成为丰富多彩的“杨”文化。

2. 梅——从物候之象到少女怀春之象

远古时代,野生之梅(今之青梅或杏梅)为黄河中下游、长江中上游广大地域众多神山上的神木,是这些地区世居族群的崇拜物。商周时期,人们赋予梅许多社会属性,如物候之象、礼仪之象等。其中,物候之象是其最原始的文化意象。比如,《诗经·召南·摽有梅》为春秋前期召南地区贵族少女怀春思嫁之作。诗人以“梅之实”这一客观物象来象征闺中怀春之贵族少女,连续以“摽有梅,其实七兮”“摽有梅,其实

三兮”“摽有梅，顷筐暨之”三个客观事象起兴。自孟春之月梅花盛开，至仲春之月梅始结实，从“七”至“三”，由盛而衰，梅子落地，主人公依然待字闺中，淋漓尽致地表现了贵族少女怀春思嫁的急迫心情，诗人巧妙地将物候之象转化为少女怀春之象。自春秋前期至春秋中期，“梅”意象的象征意蕴逐渐多元化，如《四月》中的残暴之政侵扰万民之象、《鸛鸣》中的霸主公平善待诸侯之象等。至后世，这些文学意象发展成为“岁寒三友”与“四君子”中“梅”意象的原型意象，内化为丰富多彩的“梅”文化。

3. 桃——从物候之象到婚恋之象

远古时代，野生之桃为黄河中上游广大区域众多神山上的神木，是这些地区世居族群的崇拜物。商周时期，人们赋予桃许多社会属性，如物候之象、礼仪之象、休养生息之象、春华秋实之象等。其中，物候之象是其最原始的文化意象。比如，《诗经·周南·桃夭》为春秋初期周南贵族嫁女之乐歌。诗人依据桃“花色灿丽、果实繁多、枝叶繁茂、生殖力强”的特性，以“桃”这一客观物象来象征出嫁之女，连续以“桃之夭夭，灼灼其华”“桃之夭夭，有蕢其实”“桃之夭夭，其叶蓁蓁”三个客观事象来象征子孙兴旺而绵延不绝，诗人巧妙地将物候之象转化为婚恋之象。自春秋前期至中期，“桃”意象的象征意蕴逐渐多元化，如《何彼秣矣》中的婚恋之象、《园有桃》中的忧贫畏饥之象等。至后世，这些文学意象逐渐发展成为丰富多彩的“桃”文化。

要之，商周时代的诗人们，根据远古时代木本植物崇拜物不同的特性，对物候之象这一原始意象进行创造性继承与创新性发展，逐渐将一些植物转换成为现实社会中婚姻恋爱生活的象征物，即婚恋之象。

二、从“万物有灵”自然观到“天人合一”宇宙观的转型

上述木本植物类原始文化意象，最早见于《山海经》。就本文所涉崇拜物最原始的文化意象而言，松、榛、柞、杜、果、椒、棘、莢楚、杞皆为礼仪之象，竹、桑、柳、杨、梅、桃皆为物候之象。这些植物如何由崇拜物转变为文化意象，再由

文化意象转化为文学意象呢？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从“万物有灵”自然观到“天人合一”宇宙观的转型是最核心的因素。

原始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先民们感受到自然界具有种种无法理解的神秘色彩，这导致“万物有灵”自然观的萌发^⑨。在这一观念支配下，木本植物被看作有着人的情欲、品格、灵性、生命的特殊存在，是沟通人类与天界、神灵的中介。于是，作为原始宗教中一种最重要、最原始的自然神崇拜形态的植物崇拜，便在氏族制度时期的原始认知土壤中萌生，进而导致氏族图腾崇拜与自然崇拜的产生，先民们开始通过神话来解读自然，并逐渐由“图腾主义”神话走向“万物有灵”神话。比如，新石器时代黄河中下游地区仰韶文化遗址中，发掘出土的彩陶上有树木等木本植物图案。这些图案可能反映了先民对自然植物的崇拜或神化观念，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将植物元素用于器物装饰的早期审美意识。至今部分彝族村寨依然在夏历三月初三，由村中长者率领十二岁以上的男子举行祭祀神树的仪式，向“松树神”祈福，这种习俗应该就是“松”图腾崇拜的文化遗存。

在“万物有灵”自然观支配下，一些自然植物被视为崇拜物，特别是在神话世界里被进一步人格化、灵异化、审美化，不仅具有人体特征的神兽、神鸟穿越其间，具有人体特征的山神也经常与其相伴而生。这种原始思维成为原始人诗性地把握和领悟世界的生动方式，创造了上古神话与原始宗教这一对源于同一历史文化形态母体的“异卵”双胞胎。在共生互动、先合后分的动态演进过程中，上古神话与原始宗教发生了不同的文化转向，二者共同作用于意象图式由“象”到“意”的转换，使其成为人类文学艺术审美与文学生命化的主要文化源头。

“天人合一”宇宙观源于原始先民对天人关系的重新认识。他们由对天的敬畏和崇拜逐渐转化为对天人关系的哲学思考，这种转变凝聚在氏族部落乃至氏族部落集团的文化心理结构中。由“万物有灵”自然观到“天人合一”宇宙观的转型，大致以华夏人文始祖颛顼高阳氏时代所进行的以“绝地天通，罔有降格”为主要内容的宗教-政教改革为标志。颛顼改革通过垄断

天人沟通之道,建立了天人关系的秩序框架,使原始宗教力量汇入华夏文明理性发展的轨道,天人沟通秩序由“民神杂糅”“家为巫史”向“民神不杂”“民神异业”^①转变。

实际上,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遗址、红山文化遗址出土的大量龙(蛇)形象器物,表明早在颛顼高阳氏推行宗教-政教改革以前的母系社会后期,先民已完成了由猪到龙(蛇)、由龙到神的观念转变,他们将龙视作天神的化身,将鸟尊为天神的信使,这些原始宗教观念展现了先民对“天人关系”的早期探索与思考。商周时期是“天人之际,合而为一”宇宙观初步形成的重要时期,天人沟通的方式由祭祀和巫术转变为人的道德行为,出现了由“神本”到“人本”、由“神秘”到“理性”的转向。这种文化转向不仅对当时的生产力发展具有推动作用,也使原始先民的审美想象力更加丰富,原始艺术生产更加多元化,为植物文化意象由礼仪之象与物候之象向多样化之象拓展奠定了文化理论根基。

三、由“神话宗教认知”向“诗性审美认知”的转变

商周时期,随着社会结构、生产方式、宗教信仰、政治需求的发展变化,“天人合一”宇宙观中的“天”逐渐由“自然之天”向“义理之天”演进,原始宗教文化由自然宗教文化演进到人文宗教文化,开始追求以人文立本,感应为体,和谐共生。“天人合一”宇宙观的变迁,自然会引发生态认知方式由“神话宗教认知”向“诗性审美认知”的转变。

所谓“诗性审美认知”,是指人类在与环境交往的过程中,通过对自然环境以及其中的各种事物、现象和景象的观察,产生精神与心理上的感受,并通过文学艺术形式呈现出一定的自然情感、生态意象和环境观念。具体而言,商周时期随着图腾崇拜与自然崇拜等原始宗教观念由具象化向抽象化、由神灵化向政治化的渐次变迁,引发人与自然之间的情感对话方式发生变革。这种转变也体现在植物文学意象的经营艺术上,诗歌中的植物意象经营观念经历了一个由神灵化到人性化的演进历程。植物崇拜由

显性神灵转化为隐性神灵,并赋予其人的理性化性格内涵,植物诗歌意象实现了社会化、世俗化、多元化的演进。

要之,商周时期木本类植物意象群是“天人合一”宇宙观的自然产物,是主体与客体的和谐统一,是“意”与“象”的有机结合,是诗歌内容与形式的完美统一,是“诗性审美认知”的艺术结晶。创作主体一方面把身外之物转化储存为大脑中的感知之物,另一方面不断将内化的感知之物转化为意象之物,并在意识系统中孕育形象、立意塑体、勾画轮廓,实现了由“内化”向“意化”的转变,将意象“意化”为一个文化符号,从而使诗歌文本的表达形式与思想内容完美融合成为一个文化文本。在这个符号化的过程中,物象进一步成为创作主体理想及其文化指向的代表,逐渐演变成为中国文化的象征^[1]。

结 语

综上所述,商周时代的诗人们根据远古时代崇拜物的不同特性,对木本植物类原始文化意象进行创造性继承与创新性发展,使之由图腾崇拜或自然崇拜对象,发展为物候之象、礼仪之象等具有多元化社会属性的文化意象,进而演变成为具有丰富审美意义和象征意蕴的文学意象。从发生学视角看,《诗经》中的木本植物类意象大多是由作者通过比兴手法来进行艺术经营的,作者往往选取某种“物象”作为“兴象”。经过创作主体审美心理的转换,这些“兴象”在文学文本中变成一种具有审美意义的“意象”。在这一转换过程中,创作主体个体的审美情趣与创作客体的美感信息达到“物我同一”的完美境界,木本植物类意象作为客观物象被赋予多种意义,派生出不同的象征意蕴,从而构建出蕴含丰富文学价值、美学价值、文化价值的诗歌意象体系。

注释

①为便于行文,笔者按照“木本”与“草本”二分传统,将植物图腾崇拜物与自然崇拜物及其意象区分为“木本植物”与“草本植物”两大类。②笔者所谓“商周诗歌”主要指保存在《诗经》中的全部诗篇,也包括散见于传

世文献与出土文献中的逸诗、歌谣、谚语、鄙语等韵文。这些诗歌中的植物,有的是具有象征意蕴的意象,有的则仅仅是以客观物象或事象作为赋象、比象、兴象。③关于商周诗歌的木本植物类意象,庞朝彬、赵沛霖、蔡少军、徐登光、刘卫英、王立、刘复初、董芬芬、杨玲、王青、邱奎、王志芳等已有研究成果发表,可参考。④本文所涉及的本本植物的自然属性,详见《尔雅》《方言》《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陆氏诗疏广要》《毛诗名物解》《六家诗名物疏》《诗识名解》等,皆不具引。⑤本文所涉及的本本植物类图腾崇拜或自然崇拜,详见《山海经》《逸周书》《国语》《左传》《列子》《淮南子》《史记》《述异记》《帝王世纪》等,皆不具引。⑥本文所涉及的考古材料与民俗资料,详见苏秉琦、陈俊愉、古开弼、史念海、罗启龙、晋文、程杰等先生的发掘简报与研究论著,皆不具引。⑦本文所涉及的本本植物的社会属性,详见《周易》《诗经》《周礼》《仪礼》《礼记》《左传》《论语》《尔雅》《孟子》《国语》《管子》《列子》《庄子》《荀子》《韩非子》《大戴礼记》《毛诗序》《韩诗外传》《新书》《淮南子》《史记》《白虎通义》,以及殷商甲骨文、周原甲骨文、商周金文等,皆不具引。⑧中国文化史上自宋代以来,一直将“松”“竹”“梅”三大意象称为“岁寒三友”,将

“梅”“兰”“竹”“菊”四大意象称为“四君子”,且象征意蕴逐渐定型化。其中,“松”历冬不凋,为人之常青不老、青春永驻、生命力旺盛的象征;“梅”不畏风霜,为人之卓尔不群、超凡脱俗、威武不屈、不畏强暴之精神品格的象征;“竹”亦历冬不凋,为人之高雅、纯洁、虚心、有节之精神品格的象征;“兰”为人之操守清雅、遗世独立之精神风貌的象征;“菊”为人之凌霜飘逸、与世无争之精神品格的象征。⑨“万物有灵”论于1871年由英国人类学家泰勒提出,由朗格、马雷特、德斯科拉、卡斯特罗等人进行了推进与修正,是西方人类学、民族学、宗教学等学科领域的重要概念之一。实际上,我国自远古时代就产生了关于自然界生物的灵魂、精灵、神灵等表示“灵性存在”的一般原始宗教信仰观念。⑩《国语·楚语下》载楚大夫观射父对昭王问之语。

参考文献

- [1]邵炳军.文化变迁与“鸛”意象的生成及演化:以《鸛》《瞻印》《墓门》《旄丘》《泮水》为中心[J].中州学刊,2021(1):142-151.
- [2]汪灏,等.广群芳谱[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211.

The Changes in the Primitive Religious Culture and the Evolution of Woody Plant Imagery in the Shang and Zhou Dynasties

Shao Bingjun and Huang Zehao

Abstract: Based on the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ult objects in the ancient times, the poets of the Shang and Zhou Dynasties creatively inherited and innovatively developed the primitive cultural imagery of woody plants and gradually transformed them into the images of eternal auspiciousness, character, political life, social life and marriage and love. Based on the basic premise of nature worship beliefs, these images gradually hide their original religious symbolism, but highlight habitual forms of association. Therefore, they show the chain of dynamic and continuous changes from the totem worship or nature worship objects, to the images of physical phenomena, cultural images with diversified social attributes, and then to literary images with aesthetic significance and rich symbolic meanings. The specific reason for the dynamic and continuous evolution of this symbolic system chain is that the primitive religious symbolism has gradually changed from explicit to implicit. The direct cause is that the primitive religious culture has evolved from natural to humanistic religious culture, while the internal logic is that the philosophical concept has shifted from the natural view of “all things have spirits” to the natural view of “heaven and humans are united as one”.

Key words: “all things have spirits”; “heaven and humans are united as one”; Shang and Zhou Dynasties; cultural changes; the evolution of woody plant imagery

[责任编辑/漱玉]